

以群 文艺论文集



JINZHUN LUNWENJI

W

以群文艺论文集

YI QUN WEN YI LUN WEN JI



上海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8039

948039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朱展程

以群文艺论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5 插页 精 9 平 6 字数 461,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精 1—1,800 册 平 1—10,000 册

书号：10078·3368 定价：精 3.85 元 平 2.20 元

致叶新跃同志的信

新跃同志：

收到来信和《以群文艺论文集》目次，我很庆幸您父亲的遗著能以及时问世。我回顾早年和他共事的艰苦岁月，想到他最后竟含冤饮恨以终，真是感慨万端，不胜痛惜。但真理和正义是永在的，他一生为革命文艺事业辛勤劳动的功绩也将永远被后人所记忆。他的一些生前战友将会对他的生平和著作作出公正的评价，不用我多说了。

匆复，并祝
您们全家都好。

周 扬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

忆风云 咀霜雪

——怀以群，聊自遣

于 伶

以群同志用“华蒂”这笔名投身于革命文艺运动，是他很年轻的时候。记得三十年代之初，我在北平读书时，就读到他的文章了。那是袁殊翻译的剧本《最初欧罗巴之旗》，华蒂在为它写的序言或后记中，介绍了原剧作者日本最早的左翼戏剧家、左翼剧场的发起人之一村山知义，和这个剧本的主要内容：一八四〇年，号称大英帝国的军舰大炮、坚甲利兵，开始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最初出现的欧罗巴旗帜！那是在以群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因为参加爱国反日运动被驱逐归国之前还是之后，我记不确实了。

一九三三年初，我经党组织调来上海，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总盟的组织工作，在一次党内小型会议上，认识了“左联”的组织部长华蒂同志。他当时才二十二岁哪。可是他那低沉悠慢的发言，汇报“左联”的组织情况，盟员作家和盟友们的活动，是那么慢条斯理、简洁明确；他那深沉的外冷内热、温和微笑的风度；言谈的思想修养内涵、成熟干练的程度，却给了我很好很深的印

象。同是地下党中人，肝胆相照倍相亲。一见如故，我衷心地钦敬这位从事左翼文艺理论工作的青年华蒂同志。

他和我第二次相见是在当时的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上。

今天，当我提笔沉思怀念以群同志时，记忆的荧光屏幕上闪现的恰恰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当年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与吕班路上的情景。左翼文艺戏剧工作者的有关情况，种种切切，我是该有上万字的回忆可写的。这里且“因短就简”吧……

一次，赵铭彝和我刚从“新地剧社”出来，偶然迎面遇见了凝重沉着的华蒂同志，相与微笑点头而去。不料几个月后，组织通知：华蒂在几位同志先后被捕之后，也被捕了！这样不幸的事，在当年文委领导的文总系统中是经常发生的。在白区上海的革命风云中，革命作家的被捕坐牢是寻常事！我们只能默祝被捕的同志们能够早日平安出狱！

一九三六年十月，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前广场上，在为鲁迅先生送葬的庄严悲怆的队伍中，我才又见到别了三年多的华蒂同志。能够见到从黑暗的牢狱里活着出来，并又同站在战斗行列中的战友，是无限欢欣的，但在这深沉哀恸鲁迅先生之丧的时刻，却只是默然握手，泪眼相照了！

从此，华蒂用“以群”与“叶以群”的新笔名以新姿态活跃在当时外侮日急的左翼文坛上。读到他在天马书店出版的文艺理论新书，我已记不清楚具体时间。我正忙着日益高涨与扩大的“国防戏剧活动”，跟以群只在文艺界救国运动集会上见过几面，都是匆匆相聚又匆匆相别。只有一次，记得是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之后，林林同志为迎接刚从日本秘密回国的郭沫若同志，在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捷克侨民楼上郭沫若同志房间里

开了个欢迎会。有郭老、潘汉年、夏衍、阿英、周扬、郑伯奇、沈起予、冯乃超、郑振铎、洪深诸位前辈在座，以群和我在一旁，听他们兴奋而深情地争相发言，忆创造社，谈延安，论抗战文艺前景的热烈情况，印象极深。惯于内蕴沉思的以群，这回脸上的表情却极为丰富、激动。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了。以群去武汉，后在重庆积极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留守孤岛上海的我，只能通过他参与编辑的《抗战文艺》等刊物，读到他战斗的文章：阐述抗战文艺理论的，批判“文艺与抗战无关”谬论等的檄文！以群托了往来重庆与上海之间的“上海杂志公司”的工作人员，带给我一次长信。信上要我代他办一件什么事情之外，还谈到，他跟许多作家一道参加过王礼锡与宋之的任团长的“作家战地访问团”的“笔征”队伍。到华北前线，深入到八路军抗日阵地去慰问、采访等种种热烈情绪，炽灼着身处危机四伏的孤岛上的我！心向往之之余，唯想如何更好地团结同道，运用一切社会进步力量，来面对敌伪、坚持戏剧战斗，以勉励自己与同仁，不辜负内地战友们的期望。

难忘的一九四一年，是八年抗战期间政治上军事上也是文艺战线上转折最大的一年。反动派突然袭击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我被调离了苦斗了九年的上海，三月十六日到了香港。

我这次秘密之行，倒不是孑然一身。蔡叔厚同志派人与我同行去港开设“中国电工公司分公司”；夏衍夫人托我带着她的十岁的爱女阿米同行，既为了掩护我这“小商人”，更为了“念女情切”的夏衍唱一曲“香岛父女会”。司徒慧敏到轮船码头上认出了我这“小商人”，把我们接进一家旅馆。夏衍、潘汉年和廖承志同志已经先在房间里了。潘廖二公问了“皖南事变”发生以来上

海的斗争情况,哪些同志已经离沪进入了苏北根据地,哪些同志已经从皖南战斗中潜行出来,路过了上海,并简述了党中央《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之后的新的方针政策的指示精神;长江局周恩来同志对重庆等地民主人士和文化文艺著名人士的周详安排等等。我吃惊地意识到:刚踏进的香港,比之孤岛上海是完全不同的一派景象,那是一种严肃沉重的、热闹中充满着对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无限激愤的气氛。许多著名人士为了抗议反动派为妄图挑起内战,消灭抗日的新四军而制造的“皖南事变”,在党的安排下,纷纷秘密离渝离桂来到了香港,将结合原在这个岛上的同仁开展一场激烈的特殊的战斗了……

汇集香岛的人物,诚是“群彦咸集、腾蛟起凤、胜友如云”,极一时之盛!今天,我因怀念叶以群,而勾忆起者不仅仅是当时许多同志的名字,而是各个人的音容笑貌、器宇风度、胸襟作风、特长与贡献,都是党的肝胆相照的患难朋友和同志们哪。峥嵘岁月,风流人物,香岛“风云会”。四十多年过去了,不少同志至今还坚持工作在第一、第二战线岗位上;许多位我们尊敬怀念的人已经离开了人间;更有许多位经江青、康生、张春桥之流的魔掌迫害,不幸含恨而长逝了!叶以群同志是被折磨、被逼死的长长的名单的前面一人,他被迫害在“大革文化之命”正式开始之初。

以群在香港的新工作是创办“文艺通讯社”,专门对海外的报纸刊物发稿,尽量向爱国侨胞的报纸报导延安、各根据地与大后方的著名文艺作品内容、新老作家动态、进步文化文艺活动情况,较好地发挥了宣传与鼓动作用。我被调离孤岛,原是经香港到东南亚去办报。所以抵港之初,以群曾和我一再商量,让我出国后搞个“文通社”的海外分社,既可节省由港一一发稿的邮资与手续,又易于避免邮检被扣,扩大发稿对象。但最终未能实现

这个打算。原来，一九四〇年之冬，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与文委书记孙冶方等同志鉴于我在孤岛的处境日益艰危，决定调我到苏北盐城“鲁艺”去搞戏剧工作，要我做好随时离沪的准备——因为当时孤岛戏剧运动与统战方面的部分工作待我安排。“皖南事变”突然发生后，组织通知我暂时稳住勿动。一个晚间，潘汉年同志的夫人董慧同志突然来到辣斐花园剧场的后台对我说：“小开”在“盖世宫”咖啡店等我。见面之后，汉年同志讲了这次事变的严重性。他奉命从香港赶来配合省委筹划应变对策措施，要我先到“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洗澡房间，约好刘晓。届时他和刘晓先后来了。他转达了恩来同志新的意见：凡是有在外面从事公开活动条件的干部，不要轻易调进根据地去。进去容易出来难，一旦需要重新调出来工作时，色彩与身份不同了，从事公开活动就困难了。鉴于“皖南事变”爆发了公开的两党磨擦，有发展成为全面内战的危险，到那时，新闻喉舌全操在反动的造谣公司手里，广大的海外爱国侨胞将会听不到我们党的声音，所以要调一批文化干部往海外去开展新闻工作。……我到港后，廖承志同志要我在等待出国护照的期间，参加组织“旅港剧人协会”与电影方面的活动。结果虽经两次改变姓名、职业等等，还是领不出护照。我在港工作到十二月八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终于被困在弹丸之岛的十八个日夜的激烈炮火中。

在十八天的战争期间与香港沦陷后的十五天内，以群专门负责照料茅盾夫妇的生活与安全，曾四次偷偷帮茅公搬家隐蔽。

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经廖承志、连贯、刘少文同志的指挥安排，在小潘同志（地下党员、青年诗人，解放后成为我党海外的实业家了）的苦心冒险奔走，布置妥当了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文

艺工作者脱离险境的秘密撤退计划。(在战争发生之前,汉年和董慧同志已经奉命秘密到上海去了。)

九日黄昏之前,我们第一批“难民”——根据小潘同志的规定,一律改穿广东式工人农民穿的“唐装”,手提小衣包或藤筐,通过了日军的检查哨岗与铁丝网,悄悄地陆续到了香港的湾仔海边的一条大木船上。计有:韬公(邹韬奋)、茅公与师母、以群、胡绳与吴全衡、戈宝权、小高、殷国秀、黎澍、恽逸群、胡仲持、廖沫沙、柏李和我等等。连贯同志面授机宜,介绍了“东江游击队”派来接应的便衣向导人员,说:要在黎明之前偷渡过海到九龙。大家是从炮声与飞机轰炸开始那天起,纷纷仓猝分散隐蔽了的,今兹劫后见面,欢乐的心情是异常的,各人都有着相同而又各不一样的惊险经历可谈,这时却都只能低声交谈一两句。黎明到来时,我们分头潜伏在四条小艇的舱内,在日本军舰的探照灯光和巡逻电艇巡视的间隙中间,小艇飞快地在天亮之前靠上了九龙海岸。避过了日军哨岗,隐伏在地下交通站内一天一夜,大家相帮着化装得更象难民些。次晨出发时,向导又领来了一直潜伏在九龙的叶籁士和老贺夫妇。我们一行人杂在成万的难民队伍中间,沿着青山公路默道着:“再会吧,香港九龙!”由向导引过荃湾镇,折上山陵小路,步行了三天三夜(有秘密接待站打尖、住宿),通过土匪地区(杨家祠堂)、伪政权地区(元朗深圳)和几道日军封锁线,到达了宝安县境内的白石龙山村,我党东江游击队曾生、王作尧两位司令员的总部所在地。曾生司令员和林平政委和大家见面,慰问。大家分住在山间树林中的草寮或小庙里。后来人来得多了,分散或移动住,住到光头仔、阳台山等处(许多有趣的广东语的村名、地名,可惜记不起了!)。也有少数拖儿带女的几家老小寄养在农民家里。接着,前面提及的“风

云会”的名流人物，也一批批扮成“难民”相继到来了。连不能行走的科学家高士其由司徒举等几位青年轮流背负着来了；刚患过伤寒重病的张铁生经人搀扶着，拄着竹棍也来了。短短几天里，有上万的文化人士经游击队派人接了出来，或分别留在游击区内住下，或转道过路走了……

茅公和师母在游击区呆了五六天，但两次因有“情况”，作了夜行军，搬住了三个地方。在这五六天之内，从香港又接连来了几大批人。“旅港剧人协会”的全体同志以及一位家属“郭嫂”（演员阳华即郭寿定的嫂子），还有胡考及其表弟，全都出来了。“风云会”中人物全都安全离开沦陷了的香港，在广东东江的惠阳、东莞、宝安三县游击区内暂时住了下来。

茅盾夫妇年高望重，难于适应这种常常要夜行军与抢搬住处的游击生活。经他自己的主张和游击队林平政委跟我们临时党支部的多方研究，布置了妥贴的路线，决定由叶以群陪伴茅公和夫人，先行离队去桂林。廖沫沙与胡仲持同行。林平同志派了几批便衣向导人员在前面开路；三五位短枪队员随侍左右卫护，以防万一。

司令部的电台损坏已久了。我们“旅港剧人协会”的演员、外号耗子的戴浩同志，在香港初沦陷时死寂的街边拾到了国民党人抛弃的一部新发报电台，这时苦心地带进来了。因此，游击队跟延安党中央叫通了电讯。这是一个特大喜讯！

阴历年的大除夕，林平政委领着一队人员，带着好不容易搞到的香烟与当地土法熬制的黄糖块，来到当时韬奋全家和我们三十多人暂住的阳台山草寮。林平同志代表曾生司令员和全体指战员向大家祝贺新春！郑重而热烈地代表党中央同志对大家表示慰问！代表当时正在延安的周恩来副主席，首先对韬奋同

志亲切关怀地慰问；然后逐一转达恩来同志对我们每个人的问候。我们鼓掌的手同时拭着激动的眼泪！大家把接受到的慰问品，土产与糖块，举在手里久久不舍得吃，看着，想着：延安！党中央！……

林平政委跟我们临时党支部开了小会，转达周副主席对国际国内战争与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东江地区敌我形势的估计；对所有尚留在游击区的人员的去向与安排的意见等等。会后他又到另外几个地方去分头慰问了。

恩来同志对我的指示是：由我与柏李、章泯、江韵辉组一小队暂留在游击区工作一个时期，准备待上海我党组织略为稳定时，经上海转往苏北“鲁艺”去搞戏剧工作。后来由于战局变化，未能成功。

我们最后离东江的四人，由韶关辗转到桂林。等到冬天，桂林党的负责人张友渔、韩幽桐同志转给我们恩来同志的电报：由章泯和留在桂林的“旅港剧人协会”成员回重庆，成立“中国艺术剧社”。我因《长夜行》剧本在桂林演出，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才一人到了重庆。第二天三十一日，我赶去参加了洪深先生五十大寿茶会，会上一下子会见了许多新老剧友，热情一番。

元旦下午，夏衍、冯乃超同志领我到红岩的党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报到。在那里，见到了我倾心崇敬的亲爱的恩来同志、邓大姐、董老、廖梦醒、徐冰和李少石、吴克俭、钱之光、于刚、张颖诸同志。也见到了潘梓年、章汉夫、刘少文、许涤新、廖沫沙、徐迈进、胡绳、石西民等，以及新从延安调来工作的同志们。接着是庆祝新年元旦，欢迎香港归来与延安新来同志的聚餐会、联欢晚会，就更欢乐热闹了。茅盾、以群等文化文艺界的旧友新交全会见了。

以群讲定了第二天陪我去拜望六年未见的郭老。从此，我担任了以徐冰、乃超任书记的党中央长江局的文委委员，和以群同在重庆的文艺工作岗位上，兼管大后方湘鄂粤桂滇战区内的“抗敌演剧队”，战斗了两年半。应是有好几万字来写的战斗生活呵！我于“双十协定”见报的那天，趁了首航上海的长江轮，先到了上海。

一九四六年初，抗战胜利后，以群复员回到了他战斗多年的上海，在初期的党的驻沪办事处（即周恩来将军公馆）周公与董老领导的上海工委工作。稍后在以刘晓同志等任书记的中央上海局领导下，先后由夏衍、潘梓年等任书记的文委内，以群和我同是文委委员。文艺、统战与组织联络工作，一下子全落在这位稳重冷静而有无限热情与责任心事业心的文艺理论家叶以群身上！

他继续坚持与开展着“中国文化联络社”工作，这是一九四一年香港“风云会”中的“文艺通讯社”的继续，一九四三年由茅盾任社长，以群任总编辑，在重庆再建的文化文艺通讯与宣传机构。

他创办了“新群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二十六部在今天看来还是精选的高质量的翻译与国内的文艺作品。其中有茅盾、艾青、沙汀、艾芜、荒煤、刘白羽、徐迟、李嘉、于逢、艾明之等的好作品。

他参加经营了“利群书报联合发行所”，发行“新群”的书籍，代售党的刊物《文萃》及《人物杂志》等多种进步书刊。

他帮助与支持原是一九四六年由凤子、丁君匋、周钢鸣、马国亮等在桂林出版的《人世间》，在上海复刊。由凤子、丁聪、冯亦代等主其事。由于以群体现的党的正确策略的影响，这个刊

物经过辗转的关系，居然搞到“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其人捐的一千元的无条件的“投资”。

他曾动员与支持凤子同志接受编辑《海天》三日刊。那是老牌反共的《扫荡报》后身《和平日报》的副刊。凤子打进去占领这个阵地之后，居然发表过由“文化联络社”转发的丁玲同志反映解放区人民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以及郭老的文稿。凤子编辑这块小阵地的时间当然不可能长。要知道那正是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破裂，反动派全面进行内战的时期哪！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以群团结活动能力之强和方法之多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是田汉同志的五十岁生日。当时内战方殷，在上海的进步文化文艺工作者，已经先后分批撤往解放区或香港。恩来同志已由南京梅园的中共办事处撤往延安。上海思南路中共办事处的董老和其他人员也准备撤退。为了显示进步戏剧电影界的团结，为了和将留上海的同志们告别，也为了安定靠拢在我们周围而又不可能撤离上海的各地戏剧曲艺界同仁的人心，我请示董老并经同意：借着为田汉祝寿之名，搞一次撤退前的大集会，展现一下我们的团结力量。在宁波同乡会礼堂，举行了由洪深主持的，五六百人参加的“庆祝田汉五十寿辰及创作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到会者的心情沉重而情绪热烈，会开得很成功！第二天一早，以群、吴天、洪深（原在无锡导演《丽人行》赶来赴会的）、夏康农教授和我拥着田汉，赶到无锡去看田老住在我家里时特地为上海剧艺社写的，因内战而剧艺社停办，转给抗敌演剧九队在无锡首演的《丽人行》。以群在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后又为无锡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做了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秋，在宋庆龄、许广平、廖梦醒同志领头之下，为

救济贫病文化文艺工作者，我们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著名文艺家画家的书画展览义卖，各剧种名演员的义演与物品义卖的游园大会（借座虹桥上海银行俱乐部的大花园）。郭沫若、茅盾与许多文学家写了字，美术家画了许多画，歌唱家演唱名曲。周信芳演了麒派代表作《跑城》。从来拒绝唱“堂会”的袁雪芬和尹桂芳、徐天红演了《楼台会》。沪剧、甬剧、锡剧、评弹的代表性演员也都登台演出。行知学校学生跳了秧歌舞。田汉、洪深陪着梅兰芳到两个临时搭建的舞台后台欢笑慰问，我只穿梭地为化妆、卸装的演员们倒换洗脸水等等。许广平与廖梦醒大姐却热心地在观众中义卖节目单与说明书。宋庆龄同志到场了，全场热烈地鼓掌使得台上的表演也停了一下。有几位在八年抗战的辛劳中贫病交困的文艺工作者，激动得流了泪。在筹备会上曾考虑过：宋庆龄先生出面主持，小特务们还可能会来搞些小麻烦，决定要我事先想想办法。我只能辗转托人找关系，亲自上门送去入场券，请有力者对他们的下面打打招呼。这次游园会总算圆满完成，募集了一笔可观的救济金分发到了贫病交迫的文艺工作者手里。这次活动以群是尽了筹备与组织的大力的，是他通过廖梦醒、许广平二位去和宋庆龄同志接洽的。

这时，反动派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走投无路，狗急跳墙，悍然宣布了“民盟非法”。大批著名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文化名人，不能立足了。上海党组织指派我负责安排护送郭老与茅公离沪去香港。我在为他们办理出境与入境手续，选购外国轮船船票时，突然由于阿米巴肝脓疡发高烧不能起床了。后来是党改派以群护送郭、茅安全地秘密走了的。

一九四八年九月初，病倒十一个月的我刚能下床走动，反动派颁布了严密阻止去香港的出国法令与苛刻条例。我赶在该法

令实行的前两天，办妥了假名假身份的“合法”手续离开了上海。开往香港的美国轮船却在台湾基隆港停泊了一天一夜。因为一九四六年“新中国剧社”到台湾公演话剧，一九四七年，上海观众话剧演出公司到台湾公演时，每次都有当局查讯：于伶其人是否在内？这次轮船送上门去停泊着，我难免忧心忡忡。乘客们纷纷上岸去观光游览，我只能高卧吊铺，连饭也不下来吃。晚前，海天一色，海面海岸灯光一片，煞是美呵。好心的旅客鼓动我上去走走。我只好装作无所谓地随着人群上了码头，沿海岸闲逛，观光了叫卖各种贝壳与贝雕、极美丽的各种珊瑚的地摊，只买了一条台湾草席子，连忙回舱再事高卧。

平安到达香港码头，以群与周钢鸣来接，把我送到吴祖光同志的会客室，暂住几天。当晚，以群早已约好的汉年、乃超、荃麟、夏衍同志在“雄鸡饭店”见面。我们又在一道了，而我算是后来者！

第二天，以群领我去看望了郭老、茅公家。（不久之后，茅公进了解放区，我接着住了他的房子。）

以群这时在忙的比之重庆和上海又有所不同。简言之，是：

以群参加“七人影评”活动。夏衍在一九四六年中秋节，离开上海工委，调往南洋各埠华侨中去从事宣传与募款活动。一九四七年回香港恢复了一九四一年时办的党报《华商报》。他和孟超、周钢鸣、章泯、洪道、瞿白音、韩北屏七人集体写电影评论。开始用七个笔名联名发表，以后就只署名“七人影评”。以群到時は第八个人了，但仍署“七人影评”。我到后也加入了这九人的集体活动。这一活动在当时香港各报的影评方面，颇有较好的影响。因为是看了影片，集体讨论之后推定一人执笔写出的，文稿发排前，夏衍这位电影老内行以报纸主笔的身份校改过，这就

比较能够客观地正面而又严肃地对于所评的影片说出好是坏是坏的真实话，抓着痒处，言之有据。“七人影评”是集体负责，言论尖锐，就难免会使得当事人的影片编导演员心里有点“那个”。可是我们相信：电影事业，艺术美学，学术真理，是应当重于朋友熟人的情面的。后来，陈残云、谷柳、卢珏、李门、黄宁婴、麦大非六位同志也开始合作“粤片集评”，在《华商报》上对广东语影片展开集体批评。

以群成了新进剧作家。这时，国内著名的话剧、电影演员顾而已、顾也鲁等在港创办了“大光明影片公司”。以群编写了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野火春风》，由欧阳予倩导演，舒绣文与二顾等主演。人们都知道以群是文艺理论家，著作与翻译了许多高质量的文学理论书，为广大读者所传诵，其中有的已成为大学课本。而他于一九四二、四三年在重庆时却连着写了两个话剧，一个题名《姐妹俩》的还发表出版过。只是因当时当地的政治环境所限，两个剧本都未能搬上舞台。这次的《野火春风》，是他的处女作也成为他的最后一个剧作“天鹅之歌”了。（因为以后他忙得无法再搞这类创作。）这时，潘汉年同志常常在少数熟同志中间给以群两个美称：“新进剧作家”、“新进酒家”！前者很清楚明白；后者是因为汉年的多方面统战工作，需要时常请客。而为了他的不同对象不同程度的统战需要，往往由以群出面宴请。汉年不会喝酒，以群作为主人总得敬敬客人，主动饮两杯。实际上我们这位稳重沉着的以群是从来不贪杯不酗酒的，即使有时处在狂热的欢乐场面中，也始终保持着老练沉静的微笑态度。汉年称以群为“新进酒家”时，夏衍总是补上一句：新秀！还娇嫩！引得满座哄笑。

以群当了电影公司经理。潘汉年同志介绍来一位青年马先